

坐失良机

——从洪仁玕与容闳在南京的会晤谈起

(美国)何雅伦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未能与西方列强建立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一点尤其在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显得特别严重,因为北京条约是在使得英法满意的方式下终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还有美国)既与北京签约,即认定又刁钻又龙钟老迈的清帝国政府,尽管弊病丛生,但与之打交道总比与南京的叛乱分子打交道更为有利。其实,太平天国早在一八五三年就应利用甚至推广不少西方人士对天国事业所持的同情态度的,但他们没能这样做,这就使他们在—八六〇年以后慢慢付出了越来越高昂的代价。

洪仁玕和容闳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坚定地献身于各自有关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理想。他们两人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在南京的会晤,是太平天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方面失败这一主题的有趣插曲。

在二十世纪,容闳以其身体力行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杰出贡献及在美国代表中国移民的外交成就而声名卓著。此外,他援助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事迹渐为世人所公认了。但是他今天之所以特别有名,还是因为他是第一位从一所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他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一八五九年,当洪仁玕在南京会见容闳时,我们可以肯定,他知道后者是美国留学生。四年前即一八五五年,这两个人在香港就认识了。据容闳自传,当时他俩曾过从颇密^①。容闳未到香港以前在广州就以耶鲁毕业生而闻名。在香港,他因为有耶鲁的学位而被允许学习法律。他的留学背景当时必定是众所周知的。洪仁玕在香港必定知道,后来在南京当然也是知道了。

不过,容闳有件重要的事也许不为洪仁玕所知。一八五二年,也就是容闳从耶鲁毕业的前两年,他加入了美国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容闳当时曾向谁透露过这一点,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他在香港之所以没有表露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理由很明显,那就是,他想在英国的法律机构里谋到一个律师的位置,而这样一个位置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说,当洪仁玕一八五九年会见容闳并为之讨论容闳是否要为太平天国工作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公民、一个美国的公民在对话。这一点不管他知与不

知，但他的确知道，容闳已经甚为美国化，在从广州到香港的途中，容还在重温他的中国话呢。

然而，这两位杰出的人物却不能为一项彼此都无比坚信的事业——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而情投意合地共同工作。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插曲，也可以说象是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巨大灾难的一个缩影。这段插曲表现在，这两个怀有善良愿意的人并没有相互了解，尽管那代表太平天国观点的人与那代表一种完全西化观点的人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第二部分：南京会晤

一八五五年，容闳自美国返回中国。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跟从香港上船的引水员用中国话交谈了。八年的海外生活使他牺牲了自己的母语。他到澳门看过母亲之后便匆匆往广州就职。在广州，他着手重新温习他的口语并认真钻研文言。在赴美之前，他只学过四年的文言文。

一八五五年夏，当广东巡抚叶名琛残酷镇压省内的革命，斩首七万五千余众的时候，容闳就在广州，容闳的住所离市刑场只有半英里。一天，他去刑场观看，那种尸骸狼籍，血流盈野的景象使他感到恶心，也使他的态度由忠于朝廷而转为同情太平，他写道：“那天看到的景象使我非常激动。我当时想，太平天国的叛乱者们要推翻满清政府的图谋非常有理。我的同情完全在他们一边，我认真考虑过准备去参加太平的叛乱。但后来较为冷静地一想，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到我原先的计划，尽快恢复我的汉语水平，然后按部就班地去实现我心中的目标为好。”②

同年，容闳移居香港，与洪仁玕相识。当时，两人实际上已经谈到过将来洪仁玕到了南京之后，容闳也要去这叛乱者的大本营的可能性。从这点看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香港交游时，洪仁玕知道容闳是太平天国的同情者。

四年之后，容闳真的往访天京。正如他在自传里写的那样，他要亲自看看太平天国这班人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③

会谈在干王府里举行了三次，十一月十九和廿二，也许还有廿四。

第一次会谈时，容闳写道，干王邀请他参加太平天国的事业。容闳则提出几点他认为太平天国应着手进行的组织改革④作为答复。他认为太平天国应决定：

- 一、依据科学原则组织一支军队。
- 二、设立军事学校，培养一支有能力的军官队伍。
- 三、为建设海军设立海军学校。
- 四、组织一个文职政府，在行政机构的各部中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顾问。
- 五、建立银行体制并确定度量衡标准。
- 六、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 七、设立一个工业学校体制。

容闳还写道，他当时说，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愿意“采纳这些步骤并拨款安排施行，我非常愿意贡献我的力量，帮助实现这些改革。”⑤这就是第一次会谈的经过。

两天过去了，容闳再次被邀往干王府。洪仁玕告诉容闳，他充分理解他在第一次会谈中所提建议的重要性，但其他各王部都不在城里，他不能单独行动。这件事得等到其他领袖回来以后再作决定，到那时他将设法使得大多数人来支持容闳的计划，要是没有一致的意见他就不能负起改革的责任，第二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容闳写道，几天又过去了，干王府送来了一枚木印，授予他以某个很高的爵位。但容闳这时已经明显失去了参加太平天国事业的热情，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谢洪仁玕授予他高爵，并告诉他说“一旦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决定采纳我建议的全部或其中的一条，……我都将非常乐意为他们效劳，如果需要我效劳以帮助此事的话”。^⑥这两位杰出人物的最后一次会晤就在这样的情调中结束了。容闳随即离开天京到上海。

关于这几次南京会晤的记载寥寥无几，我们只有容闳的记述；洪仁玕在他的“供词”里只字不提容闳。柯文南曾指出过，缺乏来自（太平天国）内部的可靠证据是撰写太平天国史的一大局限。对于这两人会晤情形所作的种种解释，就象对于任何重要而又载之过简的历史事件那样，从来是众说纷纭的。

邓嗣禹在《太平天国叛乱与西方列强》一书中谈到这两人的会晤时就曾强烈批评了洪仁玕。“洪仁玕飞扬跋扈，不纳人言。例如，他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曾接见容闳（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在接见时，容闳提出了诸如按科学原则创立一支军队和海军，建立包括工业学校在内的教育体制等项建议。洪仁玕既不出努力以促进这些计划，也不接受容闳‘为帮助实施改革’而意愿效劳的表示。”^⑧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洪仁玕试图说服容闳接受一枚高爵位的印信一事。

罗香林的《香港与西方文化》一书，采用的还是容闳提供的寥寥几项事实，但对洪仁玕却作了较为有利的描绘。罗教授在引述了容闳的七点组织改革建议之后写道：“这七点反映了容闳当时头脑里的一些改革思想。洪仁玕高度重视他这些建议，也想把容闳留下担任政府工作。但是，他不能答应说容闳的建议一定会得到施行，因为政治上的改革必须得到各王部的事先同意。眼看他的建议很难有机会实施，容闳便要求发给路凭，离开洪仁玕，回到上海。”^⑩罗教授相信洪仁玕说的是实话，从而对干王持较为同情的态度。罗和邓一样，都没有提到洪仁玕所授的爵印。

最近，中国的两位太平天国专家在论述这次会晤时对待容闳的批评口吻，恰如邓嗣禹对待洪仁玕一样。徐绪典和马大正在《论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高度赞扬了洪仁玕，但却认为容闳的建议不重要（“是一种低调”）。他俩批评容闳没有提到“科学教育，发展工商业和民主制度。”还说他强调教育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太平天国当时正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俩对他投入曾国藩的帐下也很失望。^⑪

在上面提到的各位杰出的太平天国学者面前我深感惶恐，但我还是想就这则史料提出另一种解释。这样做以前，我想强调一下容闳未能投到太平天国方面来工作这件事对于天国命运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南京会晤的某些后果

失望的容闳回到上海之后认定：他只要将振兴中国的梦想置之脑后就能专心致富。

如果说他不能帮助改造中国，也起码能发财。他开始从事茶叶买卖。三年之间，生意兴隆。一八六三年的一天，亦即与洪仁玕在南京会晤大约四年之后，容闳忽然收到曾国藩的邀请函，请他往访安庆的清军大营。他没有应邀，因为他害怕从未谋面的曾国藩可能已经风闻他曾访问南京而有意将他诱捕严惩。但是，第二封邀请函接着又到。对这封信，容闳答复说，请延些时日，待更方便的时候才能成行。可第三封邀请函又至，于是容闳只好接受。

他与曾国藩一八六三年在安庆的会晤从一开始就很成功。在如何帮助中国的问题上，两人发现他们的意见一拍即合，非常投契。甚至在第一次见到容闳之前，曾国藩就已经非常理解容闳的外国教育的重要性。这点在Thomas La Fargue所著的《中国的首批留美学童》一书中讲得很清楚。这本开拓性的书首次记载了由容闳和曾国藩安排赴美学习科学技术的一百二十名中国学童前后在美两国生活经历。拉法格写道：“容闳终于找到了承认他的西方教育价值的高官，在一八七二年曾国藩去世以前，两人一直在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而共同工作。”^⑪曾国藩在向皇帝奏报同意容闳关于派遣留美学童计划的上疏中称赞容闳是个有勇有谋、精通外语、办事干练的人。

曾国藩派容闳去办的第一件差使是协助筹办江南兵工厂（即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译注）。容闳的具体任务则是赴美采购制造军器机器的基本机器设备并将其迅捷、完好地运回中国。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任务。此外，他协助江南兵工厂设立了一个翻译部门，还建议在江南兵工厂内附设一所机械工程学校以便使中国最终不必仗仰国外的工程技术人才。正因为他有这些功劳，曾国藩才同意支持他派遣中国学童赴美留学的梦想。这些学童计划要在美国住十五年，学习科学技术，吸收美国语言文化。这些学童要彻底的美国化。回国以后，他们要指导桥梁、电报线路、公路、水运、军备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而且要从一种完全西化的观点来指导这些建设。这是容闳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拉法格通过研究在美国的信件和在上海进行的个别采访追溯了部分中国学童的生活史。这批由容闳派出的中国留美学童在回国以后，尽管遇到来自那些对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持怀疑态度的满清官僚的阻力，还是慢慢地升到了有影响的位置。容闳的派遣留学生计划是中国现代化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批中国学童当时都在中国教育使团的所在地——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市——和附近一带学习。容闳不仅看管这些学童，还肩负外交使命，是中国首批驻美的两名外交人员之一。有一次，他竟然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他还是一系列重要外交信件的作者。在自传里，容闳只写了他作为外交人员的活动，但却谦逊地不写出自己的外交成就。不过，容闳作为外交家，为中国和旅美中国人服务，成绩斐然，这在石山·亨利·蔡的《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九的中国与美国华侨》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蔡高度赞扬了容闳在维护华工和华侨商人（尤其是加州和西部地区的华工和华侨商人）的生命和政治经济权益方面，以及在帮助说服黑斯总统否决旨在严格限制中国人向美国移民的第一项国会法案方面作出的外交成就。^⑫

除了外交上的许多实际成就和在中国驻美教育使团的工作，容闳还在晚年居留美国期间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帮助了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和革命活动。例如，他帮助孙中山于

一九一〇年三月中旬在加州的长滩与一些中国的革命爱国者举行了秘密会晤。一九七五年七月十日至十二日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全美中国史学会年会上，罗香林教授向大会提交的一篇论文就详细叙述并分析了容闳对革命事业的贡献。^⑬

那次大会的主旨是强调中国人士对美国的影响。在另一方面，美国对容闳（从而也就是对中国）的影响也由Edmund H. Wathy Jr在他的《容闳在美国》一文中提出来了。Wathy的文章表明，容闳的美国化程度是多么的彻底和深刻。^⑭也许在这点上我们还可以联想起，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洪秀全、罗大纲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把美国看成是潜在的盟友。一八五九年容闳与洪仁玕在南京会晤时，虽还远未取得他作为一位美国化的外交家和教育家的种种成就，但他的西方教育却已是全面影响了他的观点的。他有独特而宝贵的看法，有一肚子的学问和实际知识要奉献出来。这一切洪仁玕在一八五九年在南京的时候本来都可以享用到，要是他愿意的话，但却在一八六三年给曾国藩享用了。我们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比较还会发现到，去南京拜访洪仁玕是容闳采取的主动，而接二连三地发信往上海罗致容闳的则是曾国藩采取的主动。

第四部分：误会

让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洪仁玕与容闳一八五九年的南京会晤，看看他对第二次会见以后，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见以前所发生的事说了些什么吧。容闳写道：

“这次会见以后不几天，干王府给我送来了一个小包。我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枚木印，约四寸长一寸宽，上面刻着我的姓名和封号‘义’。‘义’即义气，表示这个爵位是王以下第四等，王是第一等。我的爵号还另写在一幅黄缎上，上面盖有干王的官印。”^⑮

容闳说，“这么高的一个太平天国四等爵位”，^⑯他拿着这件礼物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但是，他还是决定谢却。他最后一次去拜访干王，也是去辞行。他感谢洪仁玕的盛情，但说他不能接印。不过，他也表示假如太平天国决定采纳“我在第一次跟他会见时建议的全部或其中的一条，我都将非常乐意为他们效劳，如果需要我为此事效劳的话。”^⑰从他这番言语来看，如果他当时受到邀请，而且他的七条建议哪怕有一条被采纳，他就会愿意帮助太平天国的。

如果容闳在写这段的时候没记错的话，那就很可能是他对洪仁玕所授予他的爵位有所误解了。这个误解显然很大，很可能导致了他作出谢却的决定。

容闳说“义”的爵印意味着王以下的第四等，这样说显然是错的。据郭挺以、简又文、酈纯、苏均伟和Eugene Bowdman等人的研究，王以下的爵位共分六等。^⑱这些学者一致同意，王以下的六等爵位依次为义、安、福、燕、豫、侯。所有这些学者都同意“义”是一种非常高的爵位。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在最后的几年里滥封王爵，所有的爵位都降低了价值。但是，这种糟糕的政策在两人的南京会晤时还没有实行。正如酈纯所说的，“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义’和‘安’还是非常高的爵位。”^⑲

洪仁玕本身的例子也足以说明这个爵位的重要性。他一八五九年四月到南京时，洪秀全立刻封他为第三等的福爵。几天以后，他再度被提升，跳过第二等的“安”而到第

一等的“义”。最后，他被提升为王。郭挺以列举了一批得过义爵的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了好些著名的人物，如李秀成、洪仁玕、赖文光、范汝增、黄文金、林绍璋等。^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洪仁玕给他的爵位比他自己刚来时第一次从洪秀全那里得到的爵位还要高。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那么，对洪仁玕和容闳的南京会晤就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会谈没能达成协议的责任是很难归咎于任何一方的。

第五部分：结 论

综观容闳漫长的一生，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主张派留学生以图帮助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是多么积极执着；他作为外交家在保护旅美华工和华商的工作中是多么干练机警；他在美国采买造枪机器并将其运回上海的行动是多么迅速快捷；孙中山对其革命信仰又是多么的推许。假如他和洪仁玕决定联手共事的话，那么，他们对太平天国的事业会有些什么样的成就呢。

诚然，正如徐绪典和马大正在我前面所引的文章里说的，容闳向洪仁玕建议的改革方案没有提到“学习科学、发展工商业和提倡民主制度”。^②诚然，容闳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比洪仁玕的还不够全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容闳的方案确是对症下药，切合当时情况。容闳方案的头三点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他的第一点建议是“依据科学原则组织一支现代化军队。第二点是建立一所军官学校。第三点是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创设一支现代化海军”。七点中的三点都与大幅度提高太平军的战斗力有关。相反，洪仁玕在他的改革方案中就显得对建立现代化的太平天国陆海军的必要性没什么认识。（据他的自述），他甚至迟至一八六二年四月，即太平天国失败前两年还没有意识到天京被围的严重性。^②也许是一八五九年的时候，洪仁玕只是没有体会到容闳强调立即改革太平军的正确性吧。但假如这两个人携手共事，这方面正是容闳可以为之出谋划策的地方。他可以在实际上帮助太平军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帮助太平军从西方国家获得武器。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可能的。

从容闳第一次进入太平天国地区所走过的迂回路线来看，我们还可以肯定，他是知道如何不走上海而是沿长江上溯抵达南京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一定能将武器偷运进太平天国的首都而不致被清军所截获，如果他被要求这样做的话。

另外，我们知道，容闳曾迅速、高效能地办理过采买西方机器并将其载运回国以建立一家兵工厂的事务。曾国藩一八六三年派容闳经办此事时，他只用了约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考虑到路程的遥远和当时所能得到的运输工具，两年的时间是很短的，如果洪仁玕于一八五九年也提出类似的要求，不过不是买机器而是买武器的话，这样的武器装备早就会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亦即南京的最后围城开始以前运抵南京了。至于南京最后被围前是否有足够的武器运抵西京以挽救太平天国的失败那谁也说不上。但是，正如后来情势的演变看来，在最后的两年里，太平天国对任何一种的援助都用得着。更何況容闳是个办事可靠、行动迅速的人呢！

但是，比上面任何这些考虑都更为重要的是，容闳很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这种擅

长固然在他留美攻读学位的过程中就有过表现，后来在他的一生中也屡屡表现了出来。他能讲流利的英语，是个有说服力的演说家和作家，他熟悉外国人的思维处事方法，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和谈判者。容闳这些特殊的才能最为一八六二年时的太平天国所需要。当时，罗孝全从南京逃出，开始在上海污蔑洪仁玕，西方国家的态度也开始转为反对太平天国。尽管上海英领事馆翻译官麦迪乐力图将他的谎言加以驳斥，罗孝全的污蔑还是很有破坏性的。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容闳很可能成为洪仁玕和太平天国的非常宝贵的代言人。在上海，容闳素以人品高尚和留学美国而闻名，很可能有效地充任跟罗孝全抗衡的人物。他和麦迪乐很可能会组成一支强有力的辩护队伍，在上海、在英国和美国的外交报章上为洪仁玕太平天国辩护。

在他的自述里，洪仁玕谴责外国人的干预造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②③}在他的改造中国的方案中，他也是最为着重改善与外国人的关系的。但是，我们只要看看史实就清楚地见到，他个人是无法改善这种关系的，尽管他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很多西方朋友。容闳也许是当时唯一能替太平天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我在此只是诠释洪仁玕与容闳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在南京的会晤。对于会晤的结果，我们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责备或偏袒任何一方。机会一旦失去就失去了，对于两人都是如此，两方都有责任，洪仁玕本应更坚持一些，但他也的确对容闳尽了他权力范围内的最大可能了。容闳采取了主动，也的确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也应对洪仁玕在职权内所受的制约更为敏感一些。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洪仁玕给他封的是多么高的一个爵位。

从这角度看来，这次会晤无论是对洪仁玕、对容闳、对太平天国、对中国、都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公民而另一个是美国公民，坐在了一起，却错失了良机。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纽约，1909年版。

②③④⑤⑥ 同上56—57页、96页、109页、109页、112页。

⑦ 柯文南：《太平天徒》，剑桥1977年版，196页。

⑧ 邓嗣禹：《太平天国叛乱与西方列强》，牛津，1971年版，162页。

⑨ 罗香林：《香港与西方文化》，东京，1963年版，92页。

⑩ 徐绪典、马大正：《论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与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合编，广东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1983年版，348—349页）。

⑪ 拉法格：《中国的首批留美学童》，普尔曼出版社，1942年版，28页。

⑫ Tsui Shi-shan Henry：《1868至1911年间的中国与美国华侨》，Foyetteville，1983年版，39和50页。

⑬ 请参阅《早期留学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关系》一文。

⑭ 《容闳在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34卷，1965年卷，265—287页。

⑮ 容闳《西学东渐记》，110—111页。

⑯⑰ 同上111页、112页。

对太平军西征之战略分析

朱哲芳

西征和北伐,同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重大战役,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对西征战史的研究,却远比不上对北伐战史的研究那么广泛深入。至今似未见到有一部或一篇西征战史的专著或专论,且兼论亦不多见^①。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的《西征军战事纪略》以及酈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的《回师西征》,篇幅尽管均长达二百页左右,也只不过是其所搜集到的史料之整理汇纂,却“不敢妄下评论”,甚至称之为“黑暗时期”,实为“犹在黑暗中摸索或付测”^②。见于张一文《太平天国前期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西征是“一个战略性的失策”,其“教训是不少的”^③,但却未予展开论述。可见,西征战史研

究,至今仍是一个新课题。本文拟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对太平军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作一战略分析。浅陋在所难免,望获同志们的指教。

一、西征是乘虚进 击的一场大战役

太平军西征战场的开辟,是和分兵北伐所造成的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紧相联系的。而对分兵北伐所造成的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作如下的概述,即太平军分兵北伐,不仅迅速遏止了敌人兵力继续向南京方向大量集结的势头,停息了天京外围日益频繁的战火,大大减轻了敌人对

① 请参阅:(1)郭挺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海,1946年版,附录2,17—18页;(2)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1958年版,68、70页;(3)酈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北京,1963年版,239页;(4)苏均伟等《1859—1864年的太平天国国务总理洪仁玕》,载1957年的Harw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刊》,273页。

② 酈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242页。

③ 郭挺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2,63—68页。

④ 徐绪典、马大正:《论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348页。

⑤ 迈克尔《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献》,西雅图,1971年版,1529页。

⑥ 同上,1526页。

(撰写本文期间,承蒙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Karl罗博士,及数位该馆服务的先生们协助,慷慨地让我使用该馆宝贵的太平天国史料,特此鸣谢)。